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4年第4期合刊
（总第21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动态关注

■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 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北京成立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修改城市规划

媒体聚焦

■“京津冀一体化”的现实意义与推进路径

■国内演出团体缘何扎堆“金色大厅”？

尖峰观点

■王蒙：没文化的传统和“庸俗”生活

■李迪华：城市生态建设从抛弃“伪生态观”开始

海外视野

■美国城市群的发展经验

■日本银行业普遍看好文化产业

研究院之声

■我院成立“微文化研究中心”并新聘五位学术委员

■我院召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也是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城镇化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增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建设和谐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因中心城区功能过度叠加、人口密度过高或规避自然灾害等原因，确需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与行政区划相协调，科学合理编制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统筹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商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加强现有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

要顺应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把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间。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与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相协调。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保存城市文化记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鼓励城市文化多样化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形成多元开放的现代城市文化。

（据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4 年 3 月 16 日）

■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对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做出全面部署。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但有待进一步加强。要加快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加大文化领域对外投资，力争到 2020 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搭建若干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使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状况得以扭转，对外文化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大幅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明确支持重点。鼓励和支持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文化贸易业务，并享有同等待遇。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加大内容创新力度，创作开发体现中华优秀文化、展示当代中国形象、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编创、设计、翻译、配音、市场推广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支持文化企业拓展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鼓励各类企业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开展文化领域投资合作，建设国际营销网络，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对文化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加大财税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支持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对文化服务出口、境外投资、营销渠道建设、市场开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支持。强化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金融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融资。

（据新华网，2014 年 3 月 25 日）

■ 文化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

3 月 25 日至 26 日，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全国文化金融合作会议，并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

要继续深入落实《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各项措施，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政策协同配合，按照差异化、精细化、科学化原则，继续加大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金融支持，完善对文化产业薄弱领域的金融服务，引导文化企业科学投资经营，优化文化产业投融资结构，缓解金融服务供给与文化发展需求间的矛盾，促进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要创新文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文化金融服务组织形式；建立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

务体系；探索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创新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快推动适合文化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完善文化企业信贷管理机制；加快推进文化企业直接融资；开发推广适合对外文化贸易特点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加大金融支持文化消费的力度；推进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文化资产管理方式。

（据文化部网站，2014 年 3 月 17 日）

(2)政策解读

■ 蔡武：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

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他认为，杰出人才涌现很重要的一条，是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的评奖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要积极推动国家文化荣誉制度尽快出台，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术的大师就在眼前。

他指出，面对热点问题，不能在关键时刻和重要关头沉默不语，要第一时间发出权威声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曾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老大难问题，蔡武就任文化部部长后，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五个一批”的改革路径，带领全国国有文艺院团，经三年攻坚，在 2012 年胜利完成阶段性改革任务。蔡武总结其工作心得，认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充分认识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国有文艺院团发展的不平衡性，充分考虑各种艺术门类的特点和功能，不搞“一刀切”。

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本，任何文化如果丢了根脉、离了本真，必然会枯萎。对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在我国广泛流行，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节日反而受到冷落，蔡武多次表示过担忧。他庆幸现实中可喜的变化：好在近几年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重要节日或因为公休、或因为宣传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各种节日活动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据《蔡武：要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京华时报》，2014 年 3 月 24 日）

■ 孙志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任务展望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实施方案》对中央提出的任务要求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和政策保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布置了任务书。

文化体制改革要着力抓好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着眼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推动政府部门

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单一行政管理向依靠法律、科技、经济等综合管理转变，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推动文化事业单位形成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二是着眼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要以标准化、均等化为主攻方向，构建覆盖城乡、实用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三是着眼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效益，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四是着眼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就是要在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扩大文化贸易，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我国良好国际形象。五是着眼引导和支持文化改革发展，加强文化政策法规建设。主要是加快文化立法步伐，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进文化领域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

根据今年的工作要点，将启动实施 80 多项改革任务，大体有三方面：一是积极推进的改革任务，包括基本完成省级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的整合，依法减少和规范文化行政审批，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加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等。二是稳妥推进的试点任务，包括传媒企业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试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等。三是研究制定的政策文件，包括制定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指标体系，出台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细则，制定促进电影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扶持地方戏曲发展、实体书店发展政策等。

（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任务展望——访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新华网，2014 年 3 月 11 日）

2. 动态关注

■ 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 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26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

三地汇报了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开展的工作，并就协同推进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

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据新华网，2014 年 2 月 27 日）

■ 北京成立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修改城市规划

为协调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日前，北京市成立区域协同发展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李士祥担任组长，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

市规划委表示，目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总体规划修改时，将改变以往增量式、保障式的规划思路，重在做减法。要根据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反过来提出城市规模的控制目标，重点是对人口规模的控制。通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倒逼各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坚决淘汰吸引流动人口过多的产业，坚决退出高消耗、重污染产业，疏解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型专业市场等第三产业。

在功能疏解中，要与产业、功能相结合，采取措施鼓励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迁移；对于向新城搬迁的单位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还需要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促使更多居民到新城居住置业。

（据《新京报》，2014 年 3 月 27 日）

■ 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同他们就加强中德语言文化交流进行座谈。

习近平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

习近平强调，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主要是源于陌生、隔阂和不了解。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面，切忌盲人摸象。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习近平指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只要加强交流，持之以恒，偏见和误解就会消于无形。要鼓励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作用，加大语言交流合作和中西方比较研究。希望两国年轻人加强交往，传承友谊。

（据《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30 日）

■ 第十一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举行

3 月 2 日，中宣部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刘奇葆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国家发展总的目标下与各方面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开展宣传教育。首先要在全社会叫响“三个倡导”24 个字，同时要全面系统、分层面、有重点地开展宣传教育，引导人们不断加深理解认同，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加强道德教育实践。要在抓好融入上下功夫，要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融入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到实处。

（据新华网，2014 年 3 月 2 日）

■ 文化部与北京市共建中国戏曲学院

3 月 20 日，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建中国戏曲学院协议在京签署，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

文化部支持中国戏曲学院发展的重点工作包括：加强对中国戏曲学院在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需求等方面的指导，将高等戏曲艺术教育纳入全国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指导中国戏曲学院制订战略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规划，确定人才培养规模和培养规格；协调推动中国戏曲学院与文化部各司局及所属戏曲院团、研究机构、社会团体搭建产学研桥梁，共建协同创新平台；指导和支持中国戏曲学院进行人才培养工作，将中国戏曲学院纳入文化部非遗传承与人才培养整体规划进行统筹考虑等。

（据《中国文化报》，2014 年 3 月 21 日）

■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经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文化部日前牵头成立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并于 3 月 19 日在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制正式运转。

协调组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国家文物局、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中国科协、国家标准委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大事项的协商和部署。

会议强调，协调组成立后，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协调推进重大公共文化服务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实施和考核。特别是要根据基层群众需求和政府保障能力，尽快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二是建立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三是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四是统筹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重大工程。五是加强各级各类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六是以贫困地区为突破口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据文化部网站，2014 年 3 月 19 日）

■《2013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

3 月 26 日，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的《2013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首发式在京举行，并同时在人民网举办了“首届中国艺术发展与前瞻网谈会”。

《报告》对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等各艺术门类年度发展情况进行了汇集与总结。《报告》认为，2013 年的艺术创作，顺应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潮流，积极讲述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书写中国形象，用艺术的方式点亮中国梦。

《报告》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认为，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梦与个人梦之间的关系，是 2013 年艺术创作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有必要进一步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表达方式，把人民群众的人生梦想与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复兴梦紧密结合在一起，切实提升文艺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据《光明日报》，2014 年 3 月 27 日）

■ 北京公布年度文化精品工程首批重点项目

3 月 27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正式发布 2014 年北京市文化精品工程首批重点项目，共 13 个：1、话剧《理发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京剧《屈原》，北京京剧院；3、歌剧《骆驼祥子》，国家大剧院；4、电影《徽班进京》，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安徽电影集团、北京联盟影业公司；5、电影《北京时间》，(高满堂编剧)；6、电视剧《巨浪》，北京北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7、电视剧《生死三八线》，北京嘉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太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8、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北京儒意欣欣影业投资有限公司；9、电视剧《岁月如金》，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唐辉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10、电视剧《青年医生》，北京鑫宝源影视投资有限公司；11、纪录片《宋之韵——宋词》，北京三多堂传媒科技有限公司；12、长篇小说《上庄记》，(季栋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3、长篇小说《北京时间》，(荆永鸣)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些重点项目大部分将于今明两年内推出。北京市将进一步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将在全市层面加强指导统筹，并研究出台扶持政策，视达标作品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予以资助和奖励。

（据《光明日报》，2014 年 3 月 28 日）

3. 媒体聚焦

■ “京津冀一体化”的现实意义与推进路径

编者按：2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3 月底，河北省接连出台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给日渐升温的“京津冀一体化”增添了不少热度。

大部分论者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为北京、天津、河北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作为特大城市，北京人口已超过 2100 万，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问题突出，这些问题难以靠北京自己解决(据李来房等：《分析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尚需顶层设计强力推进》，新华网，2014 年 3 月 29 日)。此外，北京承载了过多的行政职能，堆积了过多的优质资源，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职业制高点都盘踞在此(据熊建：《保定“上位”能否照亮河北“灯下黑”》，海外网，2014 年 3 月 28 日)。目前，北京在人口及功能等方面的承载量以其现有发展水平和速度来看，已经接近于上限。在这种情况下，将产业、功能以及潜在的新进人口一定程度地向外转移，成为了可以想见的必然选择。通过功能的分散、资源在一定范围的重新配置，不仅可以让大城市“腾”出良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也为更多的城市提供了发展机会(据付小为：《贪大求全的城市化已不可持续》，《长江日报》，2014 年 3 月 28 日)。从三个地区中相对落后的河北省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承接首都的功能疏解，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有利于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利于接收首都的要素外溢，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有利于在城市群布局调整中，改善城市层级结构；有利于在京津的辐射带动下，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借助各方力量，抓好生态环境建设(据董辉：《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千载难逢的机遇》，《燕赵都市报》，2014 年 3 月 28 日》。

同时，很多论者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区域城镇体系不够完善，产业分工不尽合理，区域内发展落差较大，生态环境约束明显等。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共识基础上制定近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前预估风险程度，加强统筹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据李来房等：《分析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尚

需顶层设计强力推进》，新华网，2014 年 3 月 29 日)。还有人指出，京津冀一体化框架若落实到具体个案，必然遭遇诸多困难。比如，如何去判断哪些是相对低端、低附加值、高消耗、重污染的企业？一家企业选择在北京有它的成本考量，用行政手段去转移企业是否恰当？现实中，又的确有一批从北京搬迁到周边地区的企业发展远不如前。因此，建议实施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应谨慎使用行政手段，建议更多用市场手段去规划和引导。对于政府来说，在尊重市场选择的前提下应更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据朱迅垚：《用市场手段引导京津冀一体化》，《南方日报》，2014 年 3 月 28 日)。

更加全面的分析认为，调整和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北京市单独可以解决的课题，需要中央政府成立首都功能调整疏解工作领导小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调整疏解措施的顺利落实。如果涉及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机关或事业单位搬迁，则宜于侧重使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为主导，同时辅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涉及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中央级企业或大型国企搬迁，则宜于采用“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办法。如果涉及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其他企业搬迁，则应发挥北京市的向外推力与环首都地区拉力的双向作用(据方毅：《首都功能疏解：剑指京津冀一体化》，中国网，2014 年 3 月 27 日)。

■ 国内演出团体缘何扎堆“金色大厅”？

编者按：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利华提出“文化走出去，但是到底该怎么走”的问题。政协委员、海政文工团团长宋祖英自我检讨说，自己开了一个坏头，并提议要对出国演出加强审核。这使社会各界再度关注国内演出团体扎堆“金色大厅”的现象。

对于宋祖英委员的自我批评，有人认为，这并非金色大厅之过，也并非宋祖英开了一个坏头，而是有些和尚鬼迷心窍，念起了歪经(关东客：《“金色大厅”的经不是宋祖英念歪的》，《扬子晚报》，2014 年 3 月 11 日)。也有人说，宋祖英的批评也还停留在个人层面，有关部门也并没有把文化走出国门的相关制度审批程序监督好完善好，也没有将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问题解决好。“金色大厅”被刷成“土豪金”，根在崇洋媚外心理与畸形文化政绩观合力作祟的恶果，其直接目的是追名逐利。从艺术的角度讲，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对国家来说，文化大国形象难保不受损害。从惠民角度看，不管演出是由财政还是个人埋单，都是一种浪费(王地：《是谁把“金色大厅”刷成了“土豪金”》，《检察日报》，2014 年 3 月 27 日)。于是，出于对艺术、观众、国民经济利益负责的目的，通往“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金钱之路”到了必须堵死的时候了(姜伯静：《该堵住通往“金色大厅”之路了》，《贵阳日报》，2014 年 3 月 12 日)。当然，维也纳“金色大厅”不能没有“中国好声音”。当前该做的，是加强对外出演出的审批和管理，让走进“金色大厅”的音

乐，是中国最好的、最民族的音乐(汪昌莲：《“金色大厅”不能没有“中国好声音”》，东方网，2014 年 3 月 11 日)。

然而，对于“国家应该有一个规范，实行标准审批”这一建议是否对症，应该有所区分。有人进一步谈到，对出国演出加强审核，并不是好建议。中国演出行为中的主要问题，就像别的方面一样，重要的不是多还是少，不是扎堆还是不扎堆，而是权力参与过多和公共资金乱投放。个人或者团体去圆梦，不是坏事。坏事是靠权力去圆梦、靠国库去圆梦，坏事是进了金色大厅就可以回来充政绩。不应该通过增加行政审批来解决，而是要寄希望于出国演出市场的成熟理性(刘洪波：《去金色大厅圆梦，别拉上权力》，《现代快报》，2014 年 3 月 16 日)。只有艺术演出领域建立起正常的文艺市场秩序，斩断依靠体制喝奶的利益纽带，才会脱离“金色大厅”式的依赖，真正由唱给少数人听，变为唱给观众听(杨兴东：《乐团走向市场“金色大厅”才能走下神坛》，《郑州晚报》，2014 年 3 月 11 日)。

也有人借此反思，与我们到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艺人这些年来迅疾而高效的“捞金”能力。抢着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政绩观。眼下，对比狂飙突进的韩流袭击，我们的文化管理部门、演艺团体也理当反思，我们到底要发展怎样的文化产业(陈小二：《到金色大厅“镀金”与都教授来“捞金”》，《华商晨报》，2014 年 3 月 11 日)。我们不能一方面极度仇视“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又用“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来装饰自身。真正的文化输出，应具以下四大特征：1、有不可替代的原创性。2、传承自由独立的精神。3、有强大的美学准则与文化信仰。4、拥有合乎全人类的价值观(马小盐：《金色大厅“媚雅梦”：遥远的东方有一群音乐土豪》，凤凰网文化，2014 年 3 月 12 日)。

■ 文化益智类节目：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娱乐大众?

编者按：最近，多档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跃动荧屏。如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的《成语英雄》、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等。央视的《中国谜语大会》更是吸引了超过 2.8 亿的观众，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面对这一现象，广电总局、相关学者以及媒体人发表了一系列观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于今年年初下发通知，倡导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学习借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成功经验，积极开办以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原创文化节目(据白瀛：《总局通知要求广电系统多办原创文化节目》，新华网，2014 年 1 月 24 日)。一部分学者肯定了该类节目积极的文化价值和重要的教育意义。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认为，谜语中深藏着中国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精神传统，《中国谜语大会》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被认为小众的、俗世的、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推向了现代传媒的平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电视文化景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的生动

范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分析，《中国谜语大会》这个节目本身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它跟历史、生活、生活常识、逻辑训练、想象力训练、思维训练有很深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公众参与性(据高艳鸽：《＜中国谜语大会＞：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中国艺术报》，2014 年 3 月 17 日)。有论者认为，与那些追求娱乐至上、忽视思想内涵、拒绝承载社会责任、文化品位不高的选秀、相亲类电视娱乐节目相比，目前兴起的这些文化类电视节目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此外，文化类电视节目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不拘一格，加之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传承、发掘与传播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据刘燕：《原创文化类节目不怕“扎堆”》，《河北日报》，2014 年 3 月 20 日)。

关于此类文化益智类节目的实际效果，也有一部分反思的声音。有人认为，此类节目的实质是游戏与娱乐，还有部分传授知识的功能，但是其文化含量不高，娱乐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因此不应继续加温。电视文化工作者应该开展更行之有效的文化教育，将更多的人文社会学者请到台上，探讨真问题，讲解真学问，实现真正的“益智”(据金强：《评“谜语大会”：娱乐意义大于文化意义》，《中国文化报》，2014 年 3 月 11 日)。

4. 尖峰观点

■ 王蒙：没文化的传统和“庸俗”生活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

当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等。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的是实力而不是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建设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据王蒙：《没文化的传统和“庸俗”生活》，《瞭望东方周刊》，2014 年第 11 期）

■ 李迪华：城市生态建设从抛弃“伪生态观”开始

大尺度的道路系统、超大尺度的广场、超大面积的水体、不切实际的绿地率，以及远离使用人群的超大体量的文化设施综合体等都是典型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它们常常以生态和以人为本的名义出现，其实都是错误的城市观念的表现。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城市中绿地越多越生态，这是错误的。绿地过多会造成土地浪费、市民生活不便，而且还需要大量建设、管理和维护成本，导致城市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方向错误和负担加重。

错误的城市生态观念，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给生态带来破坏。以在城市中建设人工湖为例，为了保持人工湖正常水位，减少补水费用，通常需要给人工湖做严密的防渗，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水文和生态问题。城市内的人工湖把宝贵的水资源截留在城市中，会加剧下游河流断流，造成地下水补给更加困难，地下水安全和水生生态系统安全都受到威胁；经过防渗处理的人工湖水流动困难，水质容易发生富营养化；没有水生活经验的北方城市的人工湖还常常危及人们的生命。大面积的人工湖看起来很美，但不应该为了满足眼球的需要，去做实际上破坏环境的事情。

我们在对城市生态建设的评判标准上也出了问题，国家园林城市的评选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错误的导向，造成了各地城市为了看起来“绿”而盲目提高绿地总量，以及追求绿化与美化的形式主义和浪费。现今城市生态建设的评价指标跟人的生存质量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没有直接联系，好的评判标准应该回到能够同时保持“人的健康”和“城市与区

域环境健康”上来。

本质上，城市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应该从思考“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出发，重新反思“什么是城市”，进而建设人们可以“持久生活的城市”。这样的城市，人们可以时刻感受到生活便利、生活成本低，人人安居乐业。以通勤为例，表面上看似乎和城市生态建设无关，实际上，人们出行便利，不需要开车上班，就可以减少许多能源的消耗、降低环境污染、降低生活成本。这些都是城市生态建设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人口多、资源分布不均匀，土地、能源和水都是战略性短缺资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资源矛盾更加突出。我们的城市生态建设应该尽可能通过改善城市布局、功能结构，通过建设紧促型复合功能城区和城区组团，降低土地等战略性资源的消耗，在满足人们过上健康生活的要求的同时，维护城市环境的持久安全，保持城市与区域生态持续健康。

（据李迪华：《城市生态建设从抛弃“伪生态观”开始》，《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19 日）

■ 伍江：新型城镇化中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

中国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灿烂的建筑文化遗产和优美宜人的城乡传统风貌。它们是中华民族千百年优秀文化传统和文明积淀最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然而，在今日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活动使大量建筑文化遗产正在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乡传统历史风貌正在逐步消失。因此，保护好已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传承城乡历史文脉，是我们这一代人刻不容缓的历史责任。

在城乡建设中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就要保护好各类留存至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在新的建设中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特色。历史文化遗产首先是在城市和乡村中现存的各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和建筑群落。它们当中除少量法定的各级文物建筑外，大量并不具备法定保护地位。除各建筑单体外，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完整的历史村镇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虽然历史保护在我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仍有大量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村镇未得到有效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真实性原则。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和修缮中，应尽可能做到修旧如旧，通过维护与修缮使其得以延年益寿，而不是将其消灭然后以复制品取而代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整体性原则。任何一处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都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因此在城乡规划中，对于历史街区的整体保护和对于单体建筑的保护同样重要。对于不处于历史街区中的单体历史建筑，则应尽可能地保留其周边的原有环境。一般情况下，不应提倡历史建筑的迁移保护。

当然，完整保护历史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城市不应建设发展。我们对城市建设中忽视历史和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深恶痛绝，但也不赞同在新的建设行为中，通过大量建造假古董来保持和延续历史风貌。新建行为不必刻意模仿历史风貌，但对仍幸存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村落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旧城改造中应坚决刹住大拆大建之

风，对于一切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必须尽可能地予以保护。

在城市和乡村的历史保护对象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仍在使用中，因此不能简单强调保护对象的不可改动，甚至强调其内部的生活方式的“原生态保护”。事实上，经过适当改造的历史空间不仅能够很好地满足当代生活品质的需要，更会使得这种当代生活具备了更深的文化内涵。我们强调历史文化遗产再利用，但也反对“过度利用”。在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很好保护，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之时，它们的展示价值也会凸现。但如果本末倒置，为了开发旅游，最大限度地“兑现”历史文化的经济价值，就会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历史文化遗存带来伤害。

（据伍江：《新型城镇化中该如何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人民日报》，2014 年 3 月 26 日）

■ 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中国在极大地改变世界，推动世界秩序之调整，并且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调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展开。中国固然强大了，但中国不知道如何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外人不了解中国在干什么，中国准备去往哪儿，准备把世界带往哪儿。中国确实是富裕的、强大的，但中国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这样的中国精英，即便背后有财富、力量支持，也依然没有自信。这是过去几百年中，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它最为清楚地说明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但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时刻。

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古、今、中、西框架中的文化抉择问题：是保守中国文明，还是全盘模仿外部文明；是模仿日本，还是模仿苏联或者美国。一切价值、制度问题都从属于这一问题，其方案实由文化抉择之结果决定。这正是中国不断剧烈变动的根源。今天，中国精英群体必须放弃文化可以抉择的百年幻觉，踏踏实实地站在中国文明之大地上，探索其“新生转进”之道。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树立新的世界观，告别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心态，确立文明主体性意识，自信地站在中国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中国历史将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轨道之中生长，中国现代文明将走向成熟。

这样的中国将会解决目前的价值空虚，树立中国价值。儒家始终守护着中国价值，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两千多年来，通过种种教化渠道，中国价值深入民心。然而，百年来，精英群体或相信强权即真理，而完全忽视价值；或人为地将普适价值与中国价值对立，必欲毁之而后快。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不论是内部秩序之不安，还是对外缺乏道德感召力，皆因为价值空虚。中国欲安定内、外人心，就需要永恒而健全的价值。价值不是知识，最为核心、基础的价值不可能来自西方。中国价值就在中国文明中，就在中国经典中，就在儒家理念中。

至关重要的是，这样的中国价值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百年来，中国价值被特殊化，西方价值被普适化为唯一正当的价值。这完全是由于精英群体对中国价值与西方现代秩序的双重无知。只要对中国价值略加分析，对西方现代秩序的复杂性、丰富性略

有了解，就不会将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现代价值对立起来，相反，三者多有相同、相通之处。这是一个事实，也应当是一种信心。中国人完全可以儒家所守护的价值作为可普适的中国价值，在内安顿人心，支持其扮演世界历史角色。

重建文明自我之中国，可完成现代制度之构建。即便西方制度完全适合中国，它们要在中国稳定地确立，也必须经过中国文明之濡化，在中国文明的大地中营建。过去百年的中国，诸多学自西方的现代制度虽然建立，但运转失灵。其原因正在于，最初的构建没有文明的自觉。更何况，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建立了诸多制度，其中很多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而健全的。它们不应被忽视，而应获得新生转进。

（据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文化纵横》，2013 年第 3 期）

■ 张维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西方对中国不断误判的深层次原因是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一旦他们能够尊重事实，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会看到中国过去 30 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6 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成就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外部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会赶上来，中国的文化底蕴为这种文化建设和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中国是一个集 5000 年连续文明和超大型现代国家于一体的国家。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是四个超级因素的复合体，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既是中国政治治理最困难的地方，也是中国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第一，我们有占世界 1/5 的人口，约等于 100 个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人口众多意味着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一个资源紧缺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统筹协调，否则国家发展会遭遇重大挫折。第二，有幅员辽阔的国土，使中国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第三，中国使用的是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也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第四，中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源性，在人类主要知识领域内都有自成体系的东西，中华文明是一个主体文明，不是次生文明。第五，中国有海纳百川、融多样性为一体的能力。第六，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意”。这使中国更能够克服今天西方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民粹主义和短视主义等弊病和危机。第七，在经济领域内，中国不仅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并有所创新和超越，同时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中国“宏观整合力”的背后是中国数千年儒家的“天下观”和强势政府精英治国的传统。第

八，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化进入全面繁荣和复兴的新时代。

（据张维为：《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光明日报》，2014 年 3 月 24 日）

■ 张世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

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发挥了他的学说，孟子讲“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认为有了恻隐之心，才会有仁心。从恻隐之心推而广之，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儒家的仁德。恻隐之心是一种不计外在功利，不论一时利害的“不忍人之心”，这就是儒家的“仁爱”，是“仁者爱人”的开端。现在社会上出现老人摔倒没人扶、不敢扶的情况，问题就在于大家失去了起码的恻隐之心。孔孟讲的仁者爱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性的本能，是人作为自然之子所具有的原始的朴素的本能的情感和行为。这种感性的本能的仁爱之心，还需要提升到一个理性思考的层面上。孟子也简单谈到过要“思”，“思”有理性的含义。

西方人讲的“博爱”和中国的“仁爱”相似而又有区别。西方的博爱思想最初来源是基督教教义，是一种从人人平等这一点出发而表现的感情和道德。西方的博爱讲人人平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应该互相尊重，这是无差等之爱，是一种理性反思的结果。西方人的无差等之爱可以自然地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违反了基本人权，就不能因亲情而包庇。中国的恻隐之心从本能触发，不可能不受亲情的支配。中国的仁爱是差等之爱，爱有亲疏远近之别。对中国人而言，从亲情出发的孝慈才是更重要的。这种思想有助于维护伦理秩序，从而可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在当今我们的法治时代，这种没有底线的仁爱思想，就成为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障碍。当代社会，中国在法治文明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尤其是要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认识到这些源自文化意识深层的障碍性因素。

从哲学角度分析，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主张人和天，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这个境界很高远，但是是原始的、朴素的。中国的仁者爱人，也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延伸。由于把外面的自然和人看成原始地是一体的，所以中国人缺乏主体意识。中国的“仁者爱人”，必须加上现代的平等观念，必须加上对他人人格和他人的“自我”的尊重，这样的中国文化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据张世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中国文化报》，2014 年 3 月 25 日）

■ 潘鲁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与实践演进的重要线索在于发现其重要价值并促进活态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键是使之继续生存繁衍在当代社会空间中，发挥思想、文化、经济的多元作用，而不只是作为文化的标本、档案和历史记忆。近年来，亚洲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经验，概括起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非遗”资源的传统文化样式。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发源于传统手工艺的泰国设计，在传统和当代寻找灵感和平衡点，注重发挥既有的优势，一方面，利用精湛的工艺来塑造自己产品的独特性，通过现代设计方式激活古老的民间智慧；另一方面，在物料取材上，注重运用自然资源和元素，设计制造家具、家饰类产品，独辟蹊径地开拓了一条发展之路。其二，是以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存中含有丰富的传统知识、象征符号、艺术形态、生态材料和文化空间，是当代设计重要的文化基础。其三，是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例如，中国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艺美术生产要素向农村转移并形成“经销公司＋加工公司＋中间人＋农户”的产销组织形式为基础，形成综合性、本土化的“创意产能”，全面提升工艺水平，突出文化内涵，拉长做大农村文化产业链，实现传统手艺产业的再造与发展。其四，是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设计与品牌文化是国家经济成功突围的两大利器，从单项设计到工程、系统设计，都急需传统手工文化智慧的启明，这些稀缺的国家文化战略资源才是我们创新的原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文化自觉的考量，也经历着社会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和冲击。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以及广泛互联的智能终端格局正在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过往时代积累生成的精神文化财富，在非物质的、无形的价值受到重视和发掘的同时，又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简言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计算条件下的数据化、信息化及其广泛的互联传播与应用。这将有别于以往数字化保护的转化与存储，而是深度的信息、数据分析与应用，所谓“将信号转化为数据，将数据分析为信息，将信息提炼为知识，以知识促成决策和行动”，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的有效分析与处理，获得新的洞察力和价值。

（据潘鲁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

5. 海外视野

■ 美国城市群的发展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借鉴其成功经验，对推动中国城市群发展很有益处。

一是发挥“大城市群”的带动作用。2003年，美国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6万多亿左右，约占全美国GDP的67％。这一点对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2011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对全国经济贡献率只有37％，低于美国三大城市群近30个百分点，表明了中国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明显偏低。特别是京津冀城市群贡献率只有9％，很难带动广大北方地区的区位主体发展。

二是创新城市合作模式。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包括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张家口、秦皇岛、廊坊、承德等 9 个地级以上城市。但区域内仅北京、天津的发展水平较高，聚集与扩散作用无法辐射到承接能力低的中小城市，整体城市群处于效率不高的状态下，很难体现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作用。因此，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城市群尚处于城市合作的初级阶段，急需在体制和政策上创新使得城市群各级政府在更广领域内达到理想的合作，尽快朝着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城市互通、产业互动、政策互惠方向推进，共同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

三是增强城市群功能互补。城市群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达到深化和发展核心城市间的分工与协作联系。只有合作型的竞争才能体现城市群的整体力量，并且城市群内合作是城市群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天津与北京相邻，国家要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性城市，天津发展将会遇到政策和资源层面的困难，但这并不是关键制约因素。事实上，洛杉矶就是在与传统中心城市旧金山的竞争合作中发展成为全球性城市的，洛杉矶都市区橙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提升城市群核心优势。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是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与产业集群，它是城市群发展的强有力支撑。美国三大城市群正是通过主导产业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来影响和控制周边地区发展的。从世界六大城市群发展实践分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群是城市群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在不断增强城市群竞争力和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是强化城市群规划引导作用。美国城市群都很重视区域规划，尤以纽约区域为代表。1922 年纽约大都市区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 1929 年、1948 年和 1966 年发表了三份地区规划，从而为纽约大都市区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作为专业中介组织，协会提出的都是协作式规划，其目的是把各个关键利益的代表聚集在一起，政府机构只是其中的一方。当然，规划过程的结果最后还是需由政府部门来法规化。

（据姚晓东、王刚：《美国城市群的发展经验及借鉴》，《天津经济》，2013 年第 12 期）

■ 日本银行业普遍看好文化产业

在日本，银行业投身文化产业已经不是新鲜事，绝大多数银行非常看好文化产业方面的投资收益。这些银行往往会根据市场分析和自身定位，选择一个或多个领域进行投资。

早在 2006 年，野村信托银行就与日本未来行星有限公司合作，设立电影基金。此后，三井住友银行及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也参与其中，多家银行的共同融资，不仅筹集了更多资金，而且提高了投资效率。同时投资多部不同类型作品，还能降低风险。在运作模式上，相关银行只负责融资，制作发行等方面的工作则全部由日本未来行星有限公司负责。在银行业的支持下运作的电影基金，在提高电影制作水平、培养青年导演、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银行获得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2008 年，瑞穗银行确定了支持游戏软件企业、保护著作权方针，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基金。在该银行的支持下，游戏产品的开发周期大大缩短，投资回报率越来越高，实现了银行与企业的双赢，瑞穗银行随后又决定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游戏产业的投资额度。

此外，文化创意企业与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的基于知识产权的融资体系实践，对企业融资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中小企业，日本银行业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融资及融资担保项目，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酷日本”战略中，活跃着许多银行的身影。2013 年 11 月 25 日，日本成立了官民合资的“酷日本”海外开拓支援机构，对致力于日本动漫、时尚、游戏等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海外拓展业务提供资金支持。银行业成为民间资金的重要来源。

（据程佳：《日本银行业普遍看好文化产业》，《中国文化报》，2014 年 3 月 20 日）

6. 研究院之声

■ 我院成立“微文化研究中心”并新聘五位学术委员

3 月 13 日，文化研究院召开“微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会议暨学术委员聘任会。文化研究院全体学术委员和工作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新成教授向新任学术委员颁发聘书。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王祥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教授、《现代传播》杂志主编、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分别接受了聘书。刘新成教授对各位学术委员表示欢迎，并指出，诸位的加盟将为研究院的工作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

接着，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教授宣读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关于成立“微文化研究中心”的决定》。《决定》提出，为了回应互联网技术给当代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变化，体现文化研究院关注当下文化发展最新趋势的宗旨，并巩固此前文化研究院在微文化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文化研究院决定成立“微文化研究中心”，并任命本院研究人员汪民安教授为中心主任。随后，汪民安教授发表了就任致辞，他说，中心的成立是学术应对社会生活变化的实例，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使人依赖于手机等微小机器，另一方面，也为个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新的自由，中心将对相关问题给予研究，把握时代脉搏，体现研究院对当下社会的关切。

最后，全体学术委员对本年度征集到的课题进行了评议，并就研究院的发展方向、研究重点、工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我院召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

3 月 26 日，我院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

理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召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刘新成、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立出席会议并致辞。

与会专家围绕“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教授指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三个板块。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是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核心是使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是维护公民文化权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我院陶东风教授认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关注四个关键点。一是使文化产品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民主、公正、法治等普适性的价值共识作为指导思想；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培育能够独立运行的市场机制；三是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文化治理，鼓励社会自治；四是提供公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形成社会捐助、企业资助、政府投入、政府购买的供给结构，调动社会力量，提升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效率。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高书生、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胡惠林、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列生、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魏宏和竹立家等学者也出席会议，并作了精彩发言。

（本期摘编人：丁玥澍、王丽媛）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